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 吴承学 彭玉平 主编

古代戏曲与潮剧论集

吴国钦 著

海外借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 吴承学 彭玉平 主编

古代戏曲与潮剧论集

吴国钦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戏曲与潮剧论集/吴国钦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8. 11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吴承学, 彭玉平主编)
ISBN 978-7-306-06431-8

I. ①古… II. ①吴… III. ①古代戏曲—中国—文集 ②潮剧—文集
IV. ①J809.22-53 ②J825.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6797 号

出 版 人: 王天琪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廖丽玲

封面设计: 曾 斌

版式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杨文泉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84110283, 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发行部 020-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28.75 印张 505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中国语言文学文库

编 委 会

主 编 吴承学 彭玉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坤 王霄冰 庄初升

何诗海 陈伟武 陈斯鹏

林 岗 黄仕忠 谢有顺

总 序

吴承学 彭玉平

中山大学建校将近百年了。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万方多难之际，手创国立广东大学。先生逝世后，学校于1926年定名为国立中山大学。虽然中山大学并不是国内建校历史最长的大学，且僻于岭南一地，但是，她的建立与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教育关系之密切，却罕有其匹。缘于此，也成就了独具一格的中山大学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传承着人类的精神与文化，其重要性已超越学术本身。在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中，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设置更具普遍性。一所没有中文系的综合性大学是不完整的，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文、理、医、工诸多学科中，中文学科特色显著，它集中表现了中国本土语言文化、文学艺术之精神。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曾认为，语言、文学是所有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弘深而通要眇”。文学当然强调思维的逻辑性，但更强调感受力、想象力、创造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有了文学基础，才可能做好其他学问，并达到“致弘深而通要眇”之境界。而中文学科更是中国人治学的基础，它既是中国文化根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一个关键交集点。

中文系与中山大学同时诞生，是中山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近百年中，中文系随中山大学走过艰辛困顿、辗转迁徙之途。始驻广州文明路，不久即迁广州石牌地区；抗日战争中历经三迁，初迁云南澄江，再迁粤北坪石，又迁粤东梅州等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始定址于珠江之畔的康乐园。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对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来说，亦是如此。百年来，中文系多番流播迁徙。其间，历经学科的离合、人物的散聚，中文系之发展跌宕起伏、曲折逶迤，终如珠江之水，浩浩荡荡，奔流入海。

康乐园与康乐村相邻。南朝大诗人谢灵运，世称“康乐公”，曾流寓广州，并终于此。有人认为，康乐园、康乐村或与谢灵运（康乐）有关。这也许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不过，康乐园的确洋溢着浓郁的人文气息与诗情画意。但对于人文学科而言，光有诗情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具有严谨的学术研究精神与深厚的学术积淀。一个好的学科当然应该有优秀的学术传统。那么，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术传统是什么？一两句话显然难以概括。若勉强要一言以蔽之，则非中山大学校训莫属。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上亲笔题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十字校训。该校训至今不但巍然矗立在中山大学校园，而且深深镌刻于中山大学师生的心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孙中山先生对中山大学师生的期许，也是中文系百年来孜孜以求、代代传承的学术传统。

一个传承百年的中文学科，必有其深厚的学术积淀，有学殖深厚、个性突出的著名教授令人仰望，有数不清的名人逸事口耳相传。百年来，中山大学中文学科名师荟萃，他们的优秀品格和学术造诣熏陶了无数学者与学子。先后在此任教的杰出学者，早年有傅斯年、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顾颉刚、钟敬文、赵元任、罗常培、黄际遇、俞平伯、陆侃如、冯沅君、王力、岑麒祥等，晚近有容庚、商承祚、詹安泰、方孝岳、董每戡、王季思、冼玉清、黄海章、楼栖、高华年、叶启芳、潘允中、黄家敦、卢叔度、邱世友、陈则光、吴宏聪、陆一帆、李新魁等。此外，还有一批仍然健在的著名学者。每当我们提到中山大学中文学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著名学者的精神风采及其学术成就。他们既给我们带来光荣，也是一座座令人仰止的高山。

学者的精神风采与生命价值，主要是通过其著述来体现的。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谈到孔子时所说的：“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真正的学者都有名山事业的追求。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真正的学者所追求的是不朽之事业，而非一时之功名利禄。一个优秀学者的学术生命远远超越其自然生命，而一个优秀学科学术传统的积聚传承更具有“声名自传于后”的强大生命力。

为了传承和弘扬本学科的优秀学术传统，从2017年开始，中文系便组织编纂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文库”。本文库共分三个系列，即“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典藏文库”“中国语言文学文库·学人文库”和“中国语言文学文库·荣休文库”。其中，“典藏文库”（含已故学者著作）主要重版或者重新选编整理出版有较高学术水平并已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学人文库”主要出版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原创性著作，“荣休文库”则出版近年退休教师的自选集。在这三个系列中，“学人文库”“荣休文库”的撰述，均遵现行的学术规范与出版规范；而“典藏文库”以尊重历史和作者为原则，对已故作者的著作，除了改正错误之外，尽量保持原貌。

一年四季满目苍翠的康乐园，芳草迷离，群木竞秀。其中，尤以百年樟树最为引人注目。放眼望去，巨大树干褐黑纵裂，长满绿茸茸的附生植物。树冠蔽日，浓荫满地。冬去春来，墨绿色的叶子飘落了，又代之以郁葱青翠的新叶。铁黑树干衬托着嫩绿枝叶，古老沧桑与蓬勃生机兼容一体。在我们的心目中，这似乎也是中山大学这所百年老校和中文这个百年学科的象征。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致敬前辈。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激励当下。

我们希望以这套文库寄望未来。

2018年10月18日

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序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至今，吴国钦先生先在中山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毕业后继续在王季思老先生门下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从助教、讲师、副教授到教授，直到2004年1月荣休，算起来，吴国钦先生已经在中山大学学习、工作了60多年。也就是说，自从离开家乡汕头来到广州读大学以后，吴国钦先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中山大学度过的。

吴国钦先生长期在王季思先生指导下学习和工作，秉承王老的教诲，在承传王先生治学方法、学术理念、研究领域、学术风格的基础上，又结合自己的知识结构、兴趣才情、工作需要、所处时代的文化学术环境及其他条件，一直有意识地探寻着自己的学术道路，努力形成自己的研究习惯和治学风格。通过研究吴国钦先生长达60多年的读书学习、教育教学、研究工作，特别是通过其主要著述、教育教学活动，我们可以窥探其治学风格与学术思想的主要方面。

一、运用古典文献学和文学文献学、戏曲文献学方法，以文献整理、校勘注释、资料考辨、史实探究为根底的治学路径

这是许多中国古代戏曲、文学研究者都需要遵循和运用的基本学术方法，也可以说是一种必备的学术基础和能力。吴国钦先生虽然不以古典文献学为主要研究领域，但在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将这一方法运用得相当充分，反映了其正确的治学方式和发展路径。《关汉卿全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的校注整理就是这一特点的有力证明。此书卷首有王季思、吴国钦合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关汉卿”条目，可以算作对关汉卿这位杰出戏曲家的总体评价，对全书来说，可以起到开宗明义的作用。全书共收录关汉卿杂剧18种，散曲小令11首、套数132套，后附上“有关关汉卿生平及评论资料汇编”，可以说是关汉卿全部现存作品的一次全面结集和整理呈现。正文中，除关汉卿的作

品外，主要包括“校记”“注解”两个部分。全书48万字。关于此书的校注情况和主要原则，吴国钦先生在《〈关汉卿全集〉校注后话》一文中说：“剧目真伪的鉴别问题”，“没有采取‘去伪存真’的做法，而是‘兼容并包’”；“关于校勘所用的本子，我采用明代臧晋叔的《元曲选》本作底本，用其他本子参校；《元曲选》无选录的关剧，则用‘脉望馆本’为底本。而对于元代的刻本《元刊杂剧三十种》，则主要用来参校”。^① 从中可见，吴国钦先生希望为读者呈现一部尽可能全面翔实、便于使用的关汉卿著作集的设想，先生关于戏曲文献整理标准、方法、目标等问题的思考和实践，从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王季思先生在《为〈关汉卿全集〉题曲》中写道：“吴生奋起游文苑，要把关老雄篇代代传。展卷披图光照眼。几番、细看，浑不觉帘外啼莺报春暖。”^② 王季思先生对弟子取得新的学术成绩的兴奋满意、热情鼓励之情溢于言表，而且，虽然年事已高，他仍然欣喜地为该书挥毫题签。整整30年后再回眸观看这些，可以发现，这也是这对师生深厚情谊的美好纪念。精心指导和亲自率领学生、晚辈一同开展学术研究，进行著作编写，通过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锻炼、培养后学，有力促进学生们的成长进步，这也是王季思先生一直以来的教育风格和学术态度。后来，这部《关汉卿全集》又以《关汉卿戏曲集》之书名，分为上下两册，于1998年11月由中国台湾里仁书局出版。这也反映了这部关汉卿著作集产生的重大影响。

1958年，正巧是所谓“大跃进”开始的那一年，关汉卿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出版了《大戏剧家关汉卿杰作集》《关汉卿研究论文集》《关汉卿杂剧选》（英文版）等著作，在短时期内迅速形成了一个集中研究关汉卿的小热潮。此后30多年的时间里，关汉卿一直是众多元杂剧作家中最幸运、最被关注甚至被追捧的一位，也逐渐成为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位，尽管流传下来的直接文献史料少得可怜，学界对于他生平事迹的真正了解、确切把握并不充分，甚至很少。可以说，在目前所知道的所有元杂剧作家中，关汉卿是运气最好的一位。这一时期出版了吴晓铃编校的《关汉卿戏曲集》等著作，还举行过一些

① 吴国钦：《〈关汉卿全集〉校注后话》，原载《广州日报》1991年10月23日，后收入《论中国古典戏曲及其他》（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180～181页）。

② 吴国钦校注：《关汉卿全集》卷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学术文化活动。直到持续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后期，还出版了北京大学中文系集体编校的《关汉卿戏剧集》。但是，由于关于关汉卿生平事迹、相关文献史实的研究难以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些外在的关注、表面的热闹并不能改变可靠文献极其有限、深入研究无法进行的学术尴尬和文化困境。也就是说，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关汉卿的关注度有所提高，但是相关文献、研究成果的进展仍然十分有限。特别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与整个中国戏曲史研究、文学史研究乃至中国人文学术的所有领域一样，得到的只是学术停滞和倒退，只有沉痛的学术文化教训。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有所改变，并逐渐走上了回归学术、尊重学术、发展学术的正确道路。因此，可以说吴国钦先生编校的《关汉卿全集》是以“科学的春天”“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新时期开始以后，最先出版的一部关汉卿文集，为中国戏曲研究界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关汉卿作品集的新版本。该书与王学奇、吴振清、王静竹共同校注的《关汉卿全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不约而同地出版，仿佛预示着关汉卿研究和戏曲史研究新时期、新热潮的到来。

此外，吴国钦先生还参加了多项中国戏曲剧本的选录、注释、鉴赏等工作。其中，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戏曲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是在王季思先生主持下，由王老的几位学生共同参与完成的。此前还有王季思先生主持、几位学生参加编写的《元杂剧选注》（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吴国钦先生参与的这些戏曲选本的评述、注释工作，不仅是进行中国古代经典戏曲作品教学、普及的需要，而且反映了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也是对选注者文献水平、基本功夫、研究能力的一种实践检验和锻炼提高。后来，吴国钦先生又编选了《中华古曲观止》（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这也是他早年学术经历特别是古典戏曲选注能力的又一次运用，同样反映了先生对于治学方法、文献根底、实践能力的重视程度和运用水平。

有一些文章也反映了吴国钦先生一向对戏曲文献很关注。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潮剧剧目研究的里程碑——〈评潮剧剧目汇考〉》一文。该文对林淳钧、陈历明编著的《潮剧剧目汇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的文献价值进行了高度评价。对于潮剧研究者来说，运用文献学方法，从剧目产生、本事、流传、搬演等方面进行基本史实的考证辨析，是

最重要的学术基础，也是做好后续研究的前提。没有相关文献史实、剧目情况的研究和呈现，真正深入细致、可靠可信的研究是无法进行的，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因此，吴国钦先生对该书的评价，就不仅仅是出于个人对于潮剧的热爱和关注，而是基于对戏曲学研究方法和基本路径的认识，表现了他对于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潮剧研究及其基本建设、发展可能的期待。

1980年春，为尽快改变高等学校中国戏曲教学研究人员断层缺乏、青黄不接的状况，教育部委托中山大学举办中国戏剧史师资进修班。王季思先生深感经过20多年的运动、动乱、停滞、倒退，高等学校中国戏剧史师资极度紧缺，远远不能适应恢复高考以后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的需要，他内心非常忧虑，非常着急，于是毅然接受了这项进修培训任务。他不仅带领培训班加速培养了一批高等学校元明清文学尤其是中国戏曲史教学和研究领域的中青年教师，同时任主编主持编写了《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吴国钦先生与王季思老先生的其他学生一道参加了这个培训班的教学、研讨及其他学术文化活动。这个培训班的举办眼光独到、恰逢其时，如同中国戏剧史和元明清文学教学研究的及时雨，不仅非常成功，而且意义非凡。这个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后来成为中国戏剧史教学和研究骨干的教师，而且编著出版了两部影响巨大的喜剧、悲剧集。此次培训班的举办及取得的成果应该在中国戏剧研究学术史、高等学校中国语言文学师资建设与人才培养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后来，郭汉城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显然也是在《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的影响与启发下进行的。

二、普及性写作与探索性著述相结合，深入浅出地把握和呈现中国戏曲总体进程的学术目标

较之于诗词、古文、骈文、史传、笔记等文学形式，中国小说、戏曲研究的起步要晚许多。近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戏曲之学，多是在日本及欧美近现代知识谱系、学科分类、学术观念、学术方法、思想文化启发之下而发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仅就中国戏曲研究而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出版，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由上海大东书局于1926年出版，这是最早或较早出版的由中国人所著的专门的戏曲史著作。之后影响较大的戏曲史就应当是徐慕云著的《中国戏剧

史》(世界书局 1938 年版)了。该书出版于抗日战争时期,也可以算是那个国家危亡、民族危难的特殊时代里中国戏曲研究学术史上留下的特殊记忆。周贻白著的《中国戏剧小史》(永祥印书馆 1945 年版)也是一部较早出版且影响较大的中国戏剧简史。此书也是周贻白后来一系列中国戏剧史著作的重要基础。之后就可能是董每戡著的《中国戏剧简史》(商务印书馆 1949 年版)了。该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出版的时间颇有象征意味。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从此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像许多其他人文科学领域一样,中国戏曲史研究并没有很快表现出新的气象和变革趋势。但是,新建立不久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已经开始对包括中国戏曲研究在内的所有学术领域进行改造和重建,逐渐开始进入破旧立新、改天换地、天翻地覆的历史变革时期。周贻白的《中国戏曲史》写作于抗日战争及其后的国内战争期间,颇历艰难困苦,前后历时 10 年方得以完成,终于由仍在上海的中华书局于 1953 年 3 月分为三卷出版,同年 11 月重印。此书由周贻白积多年戏剧理论研究、戏剧史研究与戏剧创作积累和经验而成,篇幅颇长,能够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作者对中国戏曲发展历程的总体认识,也可以代表当时及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戏曲史研究的进展和水平。仅仅几年后,由于意识形态及各方面形势发生日渐深刻的变化和人文学术观念、学术风气发生许多令人意外的剧烈变化,周贻白只得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要求,相当努力地运用当时非常流行且占有主导地位甚至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对旧作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在上文所说三卷本《中国戏曲史》的基础上进行重要调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1960 年 1 月出版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就是这种适应性改变或改造的一个突出例子,也是当时政治形势、学术要求、研究风气发生显著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和突出的反映。从著作目的、篇幅、深度、目标等方面来看,不论是《中国戏曲史》还是《中国戏剧史长编》,都属于研究专著性质,而不是普及性、通俗性的中国戏曲史读物,因为其专业性、学术性强,不大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和接受。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讲座》在 1957 年夏天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的学术讲座讲稿的基础上,于 1957 年 12 月写成,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于 1958 年 5 月出版。此书可算作一部比较通俗简要的中国戏曲史,反映了周贻白在多年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对于中国戏曲发展历程、基本特点、民族特

色、思想艺术价值等重要问题的基本看法，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戏曲简史的时代特点和学术水平。

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中国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整个意识形态迅速向“左”转，给包括中国戏曲史研究在内的所有人文科学领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以至于后来以“文化大革命”为顶峰的政治浩劫，给包括中国戏曲史研究在内的全国各个领域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在这一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内，根本谈不上任何具有学术价值的中国戏曲史研究成果了。这种每况愈下的局面，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改革开放”为主导思想的国家治理理念、发展方向的根本性调整强势开始之后，才真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许多困难、许多问题才逐渐得到解决。已经停滞、倒退了近20年的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犹如枯木逢春，重新回到被尊重、被重视的比较正常的局面，重新迎来了建设发展的新局面。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中国戏曲史也重新被关注，也获得了再续前篇、重新兴起、继续发展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出版的一本中国戏曲史著作当为周贻白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此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9年10月出版，1984年12月即获重印。可见，在多年的沉寂、萧条和荒芜之后，当时学术界和读书界对于中国戏曲史著作的热切期盼。这本《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也是周贻白一生出版的最后一部戏曲史专著，不仅比较准确全面地反映了周贻白研究积累几十年的对于中国戏曲发展历程、基本问题的认识，也是周贻白个人具有总结意义的一部戏曲史专著，而且代表着当时及其后多年的中国戏曲史研究水平，引领着许多后学继续沿着正确的学术道路开展中国戏曲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探索。虽然周贻白已于1977年12月去世，《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出版的时候，对作者来说已是遗著，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感慨万端，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应当算是周贻白的幸运，当然更是中国戏曲研究的幸运。可以说，这本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戏曲研究新时期的开始。

此后，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戏曲通史》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于1980—1981年间陆续出版。《中国戏曲通史》是一部由在新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左翼戏剧家、理论家出身的张庚、郭汉城主编，众多研究者集体编写的中国戏曲史著作。该书上册于1980年4月出版，中册于1981年6月出版，下册于1981年12月出版。这种由一二人主编，集体分

工分头编写，然后又由主编者审定统稿的著述方式，也是近数十年间兴起并延续下来的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著述方式，大概也可以算是人文学术研究和著述方式的一种显著变化吧。十多年后，这部《中国戏曲通史》又经过部分修订，合成精装本一册，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于1992年4月出版了第2版。这部《中国戏曲通史》是一部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戏曲史及戏曲理论研究基本观念、主要方法、基本格局和学术能力、著作水平的一部中国戏曲通史。当然，这种在当时表现得相当主流、相当强势的著述方式，有其人多势众、人多好干活的优势，但也不是没有其局限性，甚至有其相当明显的局限性，其间留下的学术史经验以及教训确有必要深入探讨、认真总结。

正是在这样充满朝气、充满向往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和学术风气中，吴国钦先生的《中国戏曲史漫话》出版了。此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0年6月出版，印数18000册，1983年2月又重印了3000册，两次共印刷21000册。在两年半左右的时间里，该书就有这样大的发行量，既说明在那个冰封乍解、枯木逢春的时代里，人们对于读书的渴望、对于知识的向往，也说明这本书对关心和热爱中国戏曲的广大读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该书凡21.6万字，在今天看来并不是一本篇幅很大的书，但却是一本长期积累、精心撰写、应时而出的普及性学术著作。全书从“先秦的优伶”开始，到“中国戏曲史的分期”结束，共100个专题，在广阔的中国文化背景下，展现了中国戏曲史的简要历程和精彩场面。正如该书的“内容提要”中所说：“作者以漫话的方式，对中国民族戏曲艺术的孕育、形成和发展，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戏曲剧种，对戏曲史上的主要作家、主要作品，对中国戏曲的剧本创作、表演艺术、舞台美术等方面的特点，对历代研究戏曲的主要学者及著述做了介绍，描述了中国戏曲从先秦、两汉孕育、产生起，直到近代的演变发展的历史轮廓。对戏曲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又说：“全书包括100个选题，文章短小生动，讲述深入浅出。”^①这平实准确地反映了该书的写作用意和著作风格。长期以来，吴国钦先生对自己著作的语言文字运用、著作风格有着深入的考虑并在研究和写作实践中努力践行。不仅《中国戏曲史漫话》如此，在《〈西厢记〉艺术谈》（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

^① 吴国钦：《中国戏曲史漫话》卷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专著和许多论文中，也能看到这种语言文字风格的经营和执着的学术追求。这种语言文字风格一直延续到后来，比如在《潮剧史》卷首梁卫群所作序文《潮剧史的开山之作》中，就评价吴国钦先生的文字说：“行文相对活泼，在记史的同时，还倾向可读，更注重读者层面的开阔。”^①这也可以说是对先生数十年著述语言风格的体会和概括。

从中国戏曲研究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应当认为，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戏曲史漫话》，是新时期以来第一本知识性与探索性结合、普及性与学术性兼顾、可读性与启发性兼得的中国戏曲史著作，上承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讲座》等著作而来，下启其后多种同类通俗性中国戏曲史著作的先河。从吴国钦先生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和著述来看，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部具有通览性特点的中国戏曲史著作，反映了先生对于中国戏曲基本形态、民族特色、古今变迁的基本看法，因而这本《中国戏曲史漫话》具有值得特别关注的学术史意义。

三、以宏阔的戏曲史、文学史背景为参照，以经典作家、典范作品为核心进行综合思想与艺术分析的学术功力

如同走一条路、过一条河，总会有一些地点是必须经过、无法绕过一样，研究中国戏曲时也总有那么一些作家作品、创作现象、重要问题是无法绕过、必须面对的。这样的问题也通常是中国戏曲史上最基本、最有代表性和经典性的问题。吴国钦先生数十年的戏曲研究之路，一直注意处理好点和面、面和线、线和体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注意抓住经典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以此带动相关问题的考察。在这方面，《〈西厢记〉艺术谈》可以作为代表。王季思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小引”中说：“这部书是国钦采取东坡‘八面受敌’的读书方法，从故事源流、人物形象、戏剧冲突、全剧结构、场面处理、艺术风格、语言艺术等各个方面，对《西厢记》进行反复研究，剖析其艺术成就；又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把它放在我国文学史的长河中，跟并时的关、白、马、郑诸大家的杂剧，以及从元稹之《莺莺传》到曹雪芹之《红楼梦》等爱情名著加以比较、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因此常能在前人已经达到的境界上有所进展，或在

^① 梁卫群：《潮剧史的开山之作》，见吴国钦、林淳钧《潮剧史》上编卷首序三，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前人引而未发的问题上有所发挥，这是很不容易的。”^① 在对该书予以高度评价、热情鼓励的基础上，王季思先生还借此表达了对于“文学论著”的一些“设想”：“一是思想内容的探讨和艺术形式的分析相结合”；“二是理论的高度概括和对作品的细致分析相结合”；“三是逻辑思维的明确和语言表述的生动相结合”；“除上面三点外，就戏曲作品说，还必须把剧本创作成就和舞台表演艺术结合起来看”。^② 他接着就结合《〈西厢记〉艺术谈》一书对这些见解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可见，这是王季思先生对此书的高度评价，也是他对更高学术理想的热切期待。众所周知，王季思先生是《西厢记》研究的权威，吴国钦先生作为王老的弟子，敢于对《西厢记》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探索，的确是很需要一些学术勇气和学术能力的。事实也是如此，吴国钦先生对《西厢记》进行了相当全面深入的专题研究，提出了自己对这部古典戏曲名著相当系统的看法，可以说代表了当时《西厢记》研究的进展和水平。在这部著作中，除了王季思先生提到的那些方面之外，还有一些方面是值得注意的，比如对于《西厢记》抒情喜剧色彩及其在中国古典戏曲传统中的典范性的论述，对于中国戏曲大团圆结局与民族心理和审美习惯之关系的思考，对于《西厢记》评点艺术及其与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形态之关系的探讨，对于明清两代“西厢学”的考察及其间表现出来的清晰的学术史眼光和研究史意识，对于元、明、清三代屡屡出现的《西厢记》续书现象及其价值意义的讨论，等等，在多年之后的今天看来，更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这些论题的引导性、前瞻性和启发性。可以说，吴国钦先生用力甚深的《西厢记》研究，是王季思老先生相关研究的传承、丰富和发展，也是中国戏曲研究学术方法、发展动向的反映，具有值得关注的学术史意义。

吴国钦先生的另一个学术重点是关汉卿研究，这同样是研究中国戏曲不可能不关注、不可能不认识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存在。对于关汉卿的研究，除上文已述及的运用文献学尤其是戏曲文献学方法进行关汉卿剧作及其他作品的编校整理外，吴国钦先生还非常重视将戏曲看作完整的、活态

^① 王季思：《〈西厢记〉艺术谈·小引》，见吴国钦《〈西厢记〉艺术谈》，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② 王季思：《〈西厢记〉艺术谈·小引》，见吴国钦《〈西厢记〉艺术谈》，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的、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形式，而不仅仅将其视为一种戏曲文学形式或单纯的文本形态。这种学术观念和学术眼光对于理解和认识元杂剧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戏曲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深具启发性的。正如先生在《〈关汉卿全集〉校注后话》中所说：“杂剧原是一种舞台表演艺术。在注解关剧时，需要将它‘舞台化’‘立体化’。因为戏剧的主要价值在于演出，戏剧本体论的中心课题就在于搬演，没有哪一种戏剧史上的名著不是为演出而撰写的。我在注解关剧时，力求把握这一点，从特定的戏剧情境出发给予说明与提示，避免就词语注词语，避免将生动的‘场上之曲’变成平面僵死的‘案头之曲’来注解。”^①这种认识和思路，可以说远超吴梅对于中国传统戏曲的基本看法，尤其是对于戏曲舞台性、表演性、音律性的强调，尽承王季思先生对于场上之曲、舞台搬演及戏曲综合性、完整性的认识。这种学术眼光和研究角度，对于后来的戏曲研究者也当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和借鉴价值。

对于中国传统戏曲舞台化、立体化、综合化的关注和强调，寻求尽可能贴近中国戏曲及其研究的民族化道路与可能性，这种学术意图在吴国钦先生的一些论文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比如《向古典戏曲学习编剧技巧》《马致远杂剧试论》《改革派·创新家·开拓者——论汤显祖》《诗剧〈牡丹亭〉》《理论的巨人 创作的“矮子”——论李渔》《谈“杨家将”剧目》《〈长生殿〉与〈长恨歌〉题旨之比较》等，就是这种戏曲研究眼光和学术追求的集中体现。这种学术观念和研究眼光，也是深受王季思先生学术思想和治学路径影响的结果，可以说是吴国钦先生自觉传承乃师王季思老先生学术风格的一个体现。

吴国钦先生的研究多以具体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重要戏曲现象或流派的深入考察见长，但这并不是说先生不擅长理论性、宏观性、总体性的研究。一些论文颇能体现先生对于中国戏曲若干理论问题、宏观问题及学术史经验的关注和思考。如论文《中国戏曲的民族风格与审美特征》《中国戏曲的外观系列与写意本质》《论戏曲现代化》《论中国古典悲剧》《幽默与喜剧》《瓦舍文化与中国戏剧的形成》《20世纪上半叶的元杂剧研究》等，都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吴国钦先生数十年的研究工

^① 吴国钦：《〈关汉卿全集〉校注后话》，载《广州日报》1991年10月23日，后收入《论中国戏曲及其他》，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182～183页。